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 (第1辑)

孟兆怀 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编 委 会

顾 问：李万斌

主 编：孟兆怀

副主编：成良臣 傅忠贤 杨会国

成 员：徐 峰 邓良智 蒲小梅 李 静

序

四川革命老区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境内创建的十大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它包括 20 世纪 20 年代末由中共四川地方组织领导，王维舟、旷继勋、李家俊等创建的川东、虎（城）南（岳）大（树）和蓬溪等革命根据地；1932 年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入川，建立的以通（江）南（江）巴（中）为核心、以四川为主体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以及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在我省历时一年零八个月，足迹遍布 70 个县，所建立的川康边、康巴、广（元）绵（阳）等革命根据地。

四川革命老区面积广阔，历史贡献突出。四川革命老区分布在广元市、广安市、达州市、雅安市、巴中市和阿坝州全域，以及成都市、泸州市、绵阳市、遂宁市、内江市、南充市、眉山市、宜宾市、资阳市、甘孜州和凉山州的部分区域，涉及 17 个市（州）的 81 个县（市、区）。四川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具有重要地位，既是中国革命重心由东南向西北转移的桥梁，也是红军主力由南向北战略大转移的中转基地。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是四川革命老区的核心区域和杰出代表，1934 年 1 月，毛泽东同志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高度评价：“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分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斗争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四川革命老区大多处在贫困山区，环境相对较差，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近年来，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国家扶贫攻坚规划的实施与推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发达地区相比、与四川省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加快其发展步伐不仅事关四川全省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战略目标的实现，也事关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当前，四川革命老区加快发展步伐面临重大历史性机遇：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从战略层面更加重视和支持革命老区的发展；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四川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政策支撑；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规划把包括川陕苏区在内的整个秦巴山区列为扶贫攻坚主战场之一，这将为四川革命老区加快发展带来更多项目支持；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汶川地震灾区发展振兴规划以及大小凉山综合扶贫规划等重大区域发展规划相继获批，必将为处于成渝经济区腹地、民族地区和地震灾区的四川革命老区加快发展步伐带来新的机遇；四川省人民政府于 2011 年正式发布《四川省“十二五”革命老区发展规划》，这对于指导和推动四川革命老区加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如何广泛凝聚各方面力量，群策群力，加快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的步伐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发展需要理论的支持和指导。在隆重纪念红军入川 80 周年之际，由四川文理学院主办、达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协办、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具体承办的“四川省革命老区加快发展暨纪念红军入川 80 周年”学术研讨会即将在四川文理学院举行，我们相信这次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必将对四川革命老区的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了办好这次学术研讨会，2012 年 4 月，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发出了《“革命老区加快发展暨纪念红军入川 80 周年”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截至 9 月底，共收到来自川渝两地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党政机关、文化事业单位等 30 多个单位近 70 位研究人员提交的 64 篇学术论文，涉及川陕苏区研究、老区文化资源开发及利用、老区当代发展、老区精神传承等多方面的内容。经过专家评审，从应征稿件中遴选出 45 篇优秀论文集结出版，书名定为《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第一辑）。

本书收集的 45 篇论文呈现出三个明显特点：一是研究人员广泛，“革命老区研究”正在成为研究的热点。本书的作者有来自高等院校如西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四川文理学院等的专家学者，有来自中共党史研究机构如党校、党史研究室的专家学者，有来自党政机关如政策研究室、社科联、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的专家学者，还有来自相关文化事业单位如博物馆、文化馆、战史陈列馆等的专家学者，这说明“革命老区研究”正在成为专家学者们关注的研究内容。二是研究内容丰富、研究范围广范，“尽快缩小革命老区和其他区域的发展差距，加快革命老区发展步伐”已经成为专家学者们的共同愿望。本书收集的论文有研究革命老区历史问题的，如《论红三十三军的历史功绩》《论万源保卫战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略述木门会议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川陕苏区肃反问题初探》《川陕革命根据地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基本内容》《浅析川陕苏区税收政策的特征》等；有研究革命老区精神传承的，如《论长征精神的相对普适价值》《试论四川革命老区精神的价值及传承》《延安精神的培育传承与启示》《论红军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等；有研究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保护的，如《川东北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理性审视》《川东北红色资源类别梳理及其源流追溯——兼论红色文化价值提升途径》《巴渠红色文化：达州软实力的重要构成——纪念红军入川 80 周年的文化断想》等；有研究革命老区当代发展的，如《进一步加强革命老区达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低碳视角下四川革命老区的农业发展研究》《革命老区发展的组织保障研究》《达州市城镇化发展道路研究》等；有专项研究成果，也有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成果，如《川陕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比较研究》《91 年来，中国共产党应对困难与风险的历史经验与启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入川 80 周年》等。专家学者们的研究范围既着重关注了四川革命老区、特别是川陕苏区，又涵盖了全国其他革命老区如延安革命老区、井冈山革命老区等。这些情况充分说明，革命老区研究具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巨大潜力。三是研究视野宽广、研究方法独特，关注“革命老区”这一特殊类型地区的当代发展问题已经引起专家学者们强烈的思想共鸣。本书收集的研究成果使用了文献研究法、社会调查法、综合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视角既站在革命老区又超越革命老区，既立足革命老区又不局限于革命老区，让我们感到耳目一新。透过这些研究成果，我们能够充分领略到专家学者们对革命老区所饱含的深厚感情，也能够充分感受到专家学者们对革命老区加快发展步伐的迫切期待。

我们期盼以举办这次学术研讨会为契机，凝聚全省甚至全国有志于研究革命老区问题的专家学者，共同推动革命老区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我们也期望本书的出版能对研究者们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能对党政机关了解情况、正确决策提供参考和借鉴。

孟兆怀

2012 年 12 月

目 录

川东北红色资源类别梳理及其源流追溯	
——兼论红色文化价值提升途径	李万斌
川陕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比较研究	宋 键
论红三十三军的历史功绩	蒋吉平 郑丽天
论万源保卫战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	刘仕素
川陕苏区肃反问题初探	李兴贵 罗其芳
浅述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文化革命运动	李芝兰
反“六路围攻”中的两开战役	郑丽天
旺苍在川陕苏区时期的突出地位和历史贡献	曾 楚
略述木门会议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杨先茂
红四方面军入川时环境的社会生态学分析	蒲东恩
论川陕苏区青年对革命发挥的作用	何丽君
浅析川陕苏区税收政策的特征	刘长江 黄传荣
解读川陕苏区发展农业的三项重要措施	潘耕山
万源红军歌谣的艺术特色及传承利用初探	蒲仁胜
论川陕革命根据地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贡献	张 庆 李 敏
论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思想政治工作	冯 蕾 李 敏
川陕革命根据地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基本内容	苏建坤 李 敏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	文茂琼 易江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引领和推动	梁晓宇
论长征精神的相对普适价值	陈 波 石立春 罗建玲
试论四川革命老区精神的价值及传承	马 静
延安精神的培育传承与启示	李孟然
论红军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契合	龙翔鹰
浅谈川陕苏区红色文化与红军精神	王发祯
巴渠红色文化：达州软实力的重要构成	
——纪念红军入川 80 周年的文化断想	毕英涛
川陕苏区首府巴中市红色革命遗址遗迹概述	陈 岗
川东北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理性审视	高乃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川东革命老区红色文艺的代表人物	陈正平
浅析川陕苏区红军石刻标语的社会特性	何丽君
达州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对策研究	王 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川东革命老区的红色戏剧	陈雪涛
也谈熊国炳的“高调”与“低调”	谢达成
留守老人社会支持研究	
——以革命老区邛崃市孔明乡为例	吴仁明
进一步加强革命老区达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策建议	杨会国
四川省财政收入与人口老龄化的统计分析	黄 兰
低碳时代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选择	
——以四川省达州市为研究视角	易江莹
革命老区维护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研究	
..... 杨登述 杨会国 赵燕云 霍建平 任纯刚	
川东革命老区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 SWOT 分析	
——以四川省宣汉县为例	李愈强
浅析革命老区经济发展阻碍因素与发展对策	郑 瑾
达州市城镇化发展道路研究	杨莉芸
加强城市交通拥堵治理 推动革命老区加快发展	
——基于川陕革命老区达州的实证研究	薛宗保
低碳视角下四川革命老区的农业发展研究	江 玲
川陕革命老区民众对革命精神认知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以通江县“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为例	林 莉 杜 刚
革命老区发展的组织保障研究	陈凤鸣
91 年来,中国共产党应对困难与风险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入川 80 周年	宋五一
后 记	

川东北红色资源类别梳理及其源流追溯

——兼论红色文化价值提升途径

李万斌^①

摘 要：红色文化属于革命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川东北地区现存有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成为拉动本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在财富。该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从物质到非物质层面，可谓类别众多。川东北的红色文化资源也与四川人民长期以来不畏强暴、反抗压迫的群体性格特征密切相连。在新形势下我们应自觉主动加大对川东北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力度，以更好地适应老区的发展，进而实现红色文化的价值增值。

关键词：川东北；红色文化；类别梳理；价值提升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②在新时期，加强文化传承创新，提升文化价值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而在广阔的文化领域内，红色文化以其独特的时代性、实践性、地域性及思想性特征也越来越引人注目。它是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经过多次实践形成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中国文化体系中的独特部分，更是中华民族不畏艰险、敢于抗争的精神体现。

红色文化折射出一个时代与地域的历史沧桑，也承载于红色资源基础之上。若无众多的红色资源作为支撑，红色文化也就无所依存。这些资源可能以物质形态存在，也可能以非物质形态出现。四川特别是川东北地区，既是全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诞生之地，也是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苏区的所在地，更是众多将帅故里的集聚区。同时，该地区留下的红色歌谣、诗词、故事等也十分丰硕。但在四川^③内部，红色资源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川东北红色资源的富集程度很高，本文将研究地域重心置于川东北地区。鉴于以往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基于以下问题展开：川东北现存的红色资源可以分为哪些类别？四川之所以存在如此多的红色资源，其源头到底在何处，与四川人民的群体性格有何关系？对于现存的红色文化资源，如何对其实现价值增值？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实现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为此，本文拟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并以此文纪念红军入川 80 周年。

① 李万斌，男，四川阆中人，四川文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学研究。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0/18/c_111105580.htm，新华网，2011 年 10 月 18 日。

③ 为了展现红色文化在四川地区的源远流长及保证时空一致性，在本文中，四川的范围涵盖了今重庆市，川东北则主要为四川达州、巴中、广元、广安、南充及今重庆市等地。

一、川东北现存红色文化资源类别梳理及其文化特征

红色文化资源是指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理论与实践过程中所遗留的，以精神与物质形态存在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众所周知，四川保存的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是属于四川人民的宝贵的精神与物质财富。由于历史原因，这些文化资源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大分散、小积聚的格局，川东北为红色文化资源相对集中的地区。^① 红色文化资源就其存在形态区分，有物质与非物质两种基本形态。但若以具体类别而言，现存的红色文化资源则可以梳理为以下几类：

第一，石刻文献类。川东北红色文化资源中一个富有特色的部分就是镌刻在悬崖峭壁与行道路旁石头上的红色标语与政策法规。这些标语内容极为丰富，涉及苏区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等领域。其中有名的标语有标语之王——“赤化全川”，也有《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还有《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劳动法令（草案）》等，这些石刻文献是四川红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苏区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它们在四川尤其是川东北现存数量众多。据统计，川陕地带的石刻标语达2000余条。^② 这些石刻文献属于四川当之无愧的红色文化瑰宝。

第二，器皿器物类。川陕苏区为全国第二大苏区，留下来的红色文化资源遗产极为丰富，有人称之为“红军文物露天博物馆”。^③ 仅巴中市内被博物馆收藏的红军文物就达10619件，其中一级文物13件、二级文物132件、三级文物2826件。除此之外，红军使用过的武器、货币、衣物、邮票、用具等更是红色资源中的重要部分，目前被有关部门征集的这类文物的数量达到3000余件。^④ 其中，当年苏区使用过的一种独特钱币——布币，更是十分珍贵的红色文物，是研究苏区财政经济状况的重要依据。

第三，纸质文献类。川陕革命根据地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坚持武装斗争两年有余，与中央苏区相比，时间较为短暂，留下来的红色纸质文献较为稀少，因此方显其珍贵。四川省博物院主编的《西行壮歌——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一书中指出，现藏于该单位的红色文献相对较集中，有川陕省委宣传部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以及川陕省委机关报《川北穷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等一批红色报刊文献。^⑤ 这些纸质文献与石刻文献共同构成了研究苏区历史的宝贵资料，更是宣传红色文化的一种重要媒介。

第四，遗址遗迹类。红色遗迹遗址众多也是川东北地区的一个特色。由于根据地经常遭到来自敌对力量的挑战，双方战事不断，因此留下了为数颇丰的红色遗址。这些遗址大部分仍然保存完好。红军当年仅在广元境内就留下了67处重大战役遗址。除此之外，红色政权遗址也是一个组成部分，广元老区就存有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川陕省委等各级苏维埃政权遗址1724处。^⑥ 而在达州市，更有红三十军政治部遗址、红九军军部遗址、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前线指挥部遗址等。据统计，该市现存的革命遗址达118处。

① 川东北分布着为数可观的红色资源，如纪念馆、遗址遗迹等。据不完全统计，仅达州一地即有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遗址1处（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省级3处，县市级36处，革命遗址更是达128处。见中共达州市委党史办编（内部编印）：《达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遗址简介》，2009年。

② 蔡东洲，等《从川陕苏区红军石刻看劳动者解放蓝图》，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1期。

③ 孙和平《四川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8页。

④ 孙和平《四川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8、73页。

⑤ 四川省博物院主编《西行壮歌——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01~302页。

⑥ 孙和平《四川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2页。

第五，纪念馆类。川东北地区现建立了众多的红色主题纪念馆，其中有名人故居、故里，如邓小平、朱德、刘伯承、张爱萍、王维舟等著名领导人的故居纪念馆，更有战史陈列馆、军事作战指挥部纪念馆等，如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巴中市通江县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巴中市的川陕苏区博物馆等。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讲，建构红色堂馆这种特别的公共空间，是一种以历史的记录与诠释来塑造民族记忆的方式，它将更有利于民众对红色文化与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第六，故事歌谣类。流传在川东北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如红军故事、传说等是川东北红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目前发现的红军戏剧、歌曲等文艺作品达到40余首。^①除此之外，川陕苏区还流传着众多故事，如有“红色标语王”之称的刘瑞龙（国务委员刘延东之父，他主持了川陕苏区大多数石刻标语的镌刻）为川陕苏区经济建设所作出的贡献等。但在缺乏文字记录的情况下，这些故事歌谣类的红色文化正在不断流失乃至消亡，亟待有关部门进行抢救性保护。

由以上分类可知，川东北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彰显了自身的文化价值。遍及全国，四川乃至川东北的红色资源特色何在？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讲，要充分把握住文化类型的特征，必须分析其所具有的文化特征。川东北红色文化是该地区新时代先进文化的结晶，在中国辽阔的地域内部，红色文化分布于大江南北，当年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众多革命根据地内至今还保存着大量的红色文化资源，如江西原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乃至川陕苏区等，它们除了总体特征趋于一致外，也因其各自的自然条件、人文风俗等而富有特色。总体而言，川东北的红色文化体现了时代性、思想性、实践性、地域性以及生动性等特征。

红色文化是革命年代的产物，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红色文化的载体，如红色（石刻）文献，如《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劳动法令（草案）》，著名石刻对联“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等，都展现了解放劳苦大众、反抗压迫的思想内涵，这是红色文化思想性的基本体现。红色文化是红军留在四川的重要精神财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乃至川东北地区实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川陕苏区位于四川东北部，系秦岭大巴山脉南麓，群山蜿蜒千里，在悬崖峭壁上分布着大量的坚硬岩石，当年川陕苏区政府为了宣传自己的政纲，在岩石上镌刻了大量政纲、标语等，如四川省通江县红云崖峭壁之上的“赤化全川”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些都体现了红色文化的地域性特征。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实践的产物，反映了广大劳动民众的心声，这就注定了其与生俱来的朴实无华及贴近生活的基本特质。如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当年川陕苏区政府镌刻的“工农专政”“消灭白匪”等，这些标语浅显易懂，具有“契合常人的文化知识水平、易于识记、能创设力量氛围以及凝聚人心”的特点^②，使红色文化被赋予了一种“活的灵魂”，即生动性。

二、性格记忆：四川红色文化的源流回溯

在整部中国近代史中，四川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保路运动独领风骚，到作为抗战大后方的突出贡献；从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到新中国十大元帅中的朱德、刘伯承、陈毅和聂荣臻，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和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等等，不胜枚举。近代四川可谓名人辈出，成为与湖南相比肩的重要省份。这些以挽救国家危亡为天降大任的历史人物，则

① 孙和平 《四川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

② 韩承鹏 《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33~35页。

是四川人民勇于抗争、不屈不挠的群体性格的最好体现。群体性格是可以传承与延续的，而这种传承与延续就是一种性格记忆。红色文化则与这种记忆有着直接的联系。对此，本文试着对四川的红色文化进行源流追溯。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各具特色的传统，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就不能延续和发展。四川红色文化的积淀，与四川人民与生俱来的群体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四川古称“巴蜀”，历来即有“巴出将，蜀出相”的说法，而川东北则属于古“巴”的范围。巴人的祖先为生活在川东北的一支远古族群——“人”（又称巴人），以勇武好战著称，据史料记载，人在武王伐纣、灭秦兴汉乃至楚汉之争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①《华阳国志》评价巴人为“民质直好义，士风敦厚”，而且“人多劲勇，少文学，有将帅才”。^②即巴人的性格特点为重义轻利，具有质朴刚毅、不怕流血流汗的性格特征（川东北乡村至今流传着一种体现巴人剽悍勇武的舞蹈——巴渝舞）。川东北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性格特征在后来抵御蒙古南下攻伐的过程中有着生动的体现。为抵御蒙古铁骑南下攻川，川东北不少州县都建立了军事要塞，这些防御工事形成了互为犄角之势的“抗蒙十八柱”，使得蒙古骑兵在合川钓鱼城受阻达36年之久。公元1259年，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的蒙古大汗蒙哥在钓鱼城遭到南宋守军的炮火重创，不久辞世。随后，原率军西征欧洲的诸王公为争夺汗位，纷纷停止西进转而返回草原祖庭，使原本岌岌可危的被攻击方得以喘息。钓鱼城也因此被欧洲人称为“上帝折鞭处”。可见，敢于抗争、不畏强敌是川东北人群体的禀赋及性格特质。在中国近代史上，这种刚毅民风的传承对川东北乃至四川的影响极为深远。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后，引发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当时在北京与上海等地，反抗强权、维护尊严的学生、工人运动更是此起彼伏。而此时的四川，尽管地处西部内陆，交通信息较为闭塞，但仍然掀起了浪潮汹涌的抗争运动。如在地处川东北的达县，当时就读于达县中学（今四川文理学院前身）的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戴治安、张爱萍等，迅速走上街头，带领青年学生投入到了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行列。张爱萍等人还在达县中学发起组织“烂漫社”，宣传社会主义并在达县建立了共青团组织。^③

五四运动后，国内涌现了众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团，而在此基础上一些地方的党小组也陆续成立。为了整合国内的共产党小组，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1921年7月各地党小组派遣代表前往上海，举行“一大”，并通过党纲，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但在四川，共产主义组织成立的时间还要早于中共“一大”的召开。早在1920年，著名革命家吴玉章等人就联合了一些青年组织了“青年共产党”，该组织成员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④根据近年来公布的档案，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的共产主义组织，则是目前发现在国内最早成立的党组织。这个组织当时还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一份《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它遂成为研究这个组织的第一手文献。根据其内容可以发现，该组织具有“成立时间早、规模庞大、人数众多、组织机构健全、组织程序严密、经费充裕、开展工作及其计划庞大”的特点。如该组织在四川共有成都、叙府、雅州、顺庆和重庆五个组织，总部设于重庆，并设立“书记处、宣传部、财务部、出版部”四个机构，拥有正式和候补成员近100名。同时还制定了严格的加入程序，如要求有两个成员介绍，经过五或六个月的候补期，经大会决议通过后发给党证方能成为

① 宋小武《历史在呐喊：谈古论今话达州》，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②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一·巴志》，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版，第2、12页。

③ 王维舟《我的回忆》，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

④ 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19、121页。

正式成员。^① 因此无论从成员数量、组织严密性等方面来讲,这个重庆共产主义组织都是最为完善的。当然,这个组织后来的发展如何,目前档案文献尚未发现有关记载,但它在当时的领先地位已经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状况。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川东北诞生了如戴治安、王维舟等一大批仁人志士,他们积极建立各类研究团体,如王维舟在宣汉创办宏文小学,“开始进行共产主义小组活动”,^② 为马克思主义在川东北的宣传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在全国积极发展组织。1923年,应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三大”上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由此开始了从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至1927年“七一五”事变间的合作历程。在这期间,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区域,共产党组织公开或半公开地发展成员,力量发展迅速。但在四川地区,党组织的生存艰难程度远大于广东等地,因为从四川党组织建立起,就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党组织也多次遭到破坏,党员人数变化很大。

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发动“三三一”事变,使四川省委遭到严重破坏,省委负责人杨公也被捕牺牲,这使四川地下党面临的局势更加严峻,不少共产党员更是遭受残酷追杀,省委机关屡遭破坏。^③ 在这种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四川党组织坚持以不屈不挠的毅力发展成员、扩大规模,并组织了多次罢工、兵变。为了迎接红军入川,四川地下党组织更是进行了众多的活动,如中共四川省委还发起为红军购买“四川工农号”飞机的募捐活动。^④ 从中共四川党组织的发展历程可知,尽管遭到了多次破坏,但仍然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川内积极发展。

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使四川站到了肩负抗战重任的时代前沿。在中华民族危机存亡的紧急关头,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再次携手合作。尽管国民党对中共四川党组织仍然施行打压的方针,但四川党组织仍以大局为重,努力发动民众,积极支持抗战,领导各种救亡团体努力宣传抗战到底,如组织星芒社、群力社、川大抗敌宣传团、大声社、天明歌咏团等,川东北地方团体有阆中青抗宣传团以及南充文化救亡团等。这些工作“都是旨在抗战方面帮助政府,向人民解释政府抗战的好处与困难”,^⑤ 以努力增强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

在八年抗战期间,四川为抗战胜利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不可忽视。抗战后期,四川成为大后方物质、人力供应基地。据统计,抗战八年来,四川实征壮丁人数为各省之首,达到2578810名。^⑥ 在抗战后期发起的知识青年参军运动中,四川亦是主力军,而地处川东北的达县(原川陕苏区范围,今属达州市),则有163名知识青年参军,成为“全国到达陪都的第一批”。时任达县县长的周开庆后来评价道“这是达县对于抗战的光荣贡献。”^⑦ 在八年抗战艰难取胜后,1945年10月8日,重庆的《新华日报》刊发了一篇名为《感谢四川人民》的著名社论。社论指出:“自武汉失守以后,四川成了正面战场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中心,随着正面战线内移的军民同胞,大半居于斯、食于斯、发财亦于斯。现在抗战结束了,我们想到四川人民,真不能不由衷地

① 黎余《〈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报告〉的文本价值》,载《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第124页。

② 赵开宗《中国共产党在达县的地下斗争》,载《达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9年版,第9页。

③ 如四川省委在1927年就遭到了三次严重破坏。特别是在9月和10月连续两次被破坏使“文件几乎全部损失,委员仅余三分之一”。详见《四川临时省委通告——整顿纪律严密组织事》(1927年8月12日),中央档案馆等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6—1927),甲2,1989年,第49~50页。

④ 《中共四川省委、少共四川省委联合通知》(1932年10月2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1933),甲6,1989年,第126页。

⑤ 《川康特委报告书——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七月》(1940年8月2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0—1947),甲12,1989年,第281~283页。

⑥ 周开庆《记达县智识青年从军》,《四川与对日抗战》,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246页。

⑦ 周开庆《记达县智识青年从军》,《四川与对日抗战》,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252页。

表示感激。”^①这篇社论对四川人民为坚持抗战、挽救中华民族危难作出的巨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从以上的追溯可知，从远古的巴师伐纣到近代保路运动的兴起，乃至抗日救亡的开展，从川东北诞生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到顽强生存的中共四川地下党，都彰显出了川东北人民所具备的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群体性格。而正是这种性格记忆，成为了四川红色文化积淀的内在因素。在新形势下，如何使四川尤其是川东北现有的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包括它的教育功能、记忆功能乃至社会管理创新功能等，都是值得当代学者思考的问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红色文化资源正在逐渐流失，亟待全社会的关注。

三、科学实施：川东北红色文化资源价值的提升途径

红色文化资源是属于川东北人民的宝贵财富，是时代精神生存发展之源头和基础，其生命力更体现在时代意义与精神财富上。但基于种种客观原因，该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尚未得到有效提升，较之江西苏区而言，川东北地区的红色文化挖掘，如在教育下一代、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及创新社会管理等方面都与“全国第二大苏区”的地位明显不符。在中央吹响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军的号角后，川东北地区深入开发该地的红色文化资源，提升其自身价值的紧迫性刻不容缓。笔者以为，目前应采取以下的措施实现红色资源的价值增值：

第一，建立红色文化资源的名录档案制度。开发的前提是保护。针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价值提升，有学者认为应该加快构建“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即将革命文物、文献、纪念性建筑等“红色文化遗存”强化保护，并参照文化遗产地的保护办法，对红色文化进行“局部的原风貌保护”。^②笔者以为，这种保护固属恰当，但目前很多红色文化资源轶散各地，且有的尚在无形中流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苦于不能确切地掌握目前本地尚存的红色资源确切名单，甚至对有些本属红色文化的宝贵资源的重要性尚未能取得共识，以致出现保护缺位的现象。保护红色文化资源的关键在于迅速建立起本地红色文化资源的名录档案制度，使政府与社会各界对该地现存的红色文化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有案可稽，举措始有方。

第二，抓紧时机进行口述史料搜集。红色文化与红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当年从事革命斗争的幸存老红军是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解说那段革命斗争史，可以“再现过去”，避免了对历史进行线性化描述的缺陷。针对口述史料，西方学者指出“真实的过去包含着许许多多的经历，其中一部分是重要的、关键的、值得记住的、明确的”，而这也使其“经历变得色彩缤纷，饶有趣味”。^③由于红军本身的传奇色彩，使得其故事在原川陕苏区内部广为流传。如1951年中央访问团（原通南巴先遣工作组）在其中第三次工作报告中写道，这里的人们“常能滔滔不绝地、很生动地讲述当年老红军的革命故事”。^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幸存的老红军不断去世，使得搜集口述史料的紧迫性大大加强。口述史的搜集可不仅限于红军本人，其家人亦可成为访谈的对象。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家人实际上已经扮演了访谈者和聆听

^① 《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社论 感谢四川人民》，<http://sichuan.scol.com.cn/bsxw/20050812/200581260844.htm>，四川在线网站，2005年8月12日。

^② 孙和平：《四川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

^③ （美）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④ 《中央访问团办公室（原通南巴先遣工作组）第三次工作报告》（1951年），达州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19-1-17。

者的角色。而口述史料的搜集,在人力和经费方面则需要高校与政府乃至企事业单位展开密切合作。

第三,鼓励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红色资源保护。通过建立博物馆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保护,目前已被证明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这些机构在搜集并展示红色文物的同时,也在对这些流散各地的文物进行保护。但目前来看,博物馆主要是以政府为主,民间博物馆尚未成为“后起之秀”。尽管四川有著名的建川博物馆聚落,但笔者在现场参观后发现,这个博物馆群虽然内容繁多,以民间办馆而言,可谓全国之冠。但在“红色年代系列”主题馆中,所谓的“红色”馆藏却仅限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物品,如毛主席纪念章、毛主席语录之类,可见该馆对于“红色”物品的理解过于褊狭。据笔者所知,在四川,红色主题的民间博物馆尚未建立。笔者以为,要保护现存红色文化资源并提升其自身价值,可以采取民间与官方并举的方式,如鼓励民间办馆、高校建立红色文化陈列室或者文化馆等,即以政府为主(如建立相关表彰机制),鼓励社会团体、学校、企业及个人等积极参与,发挥各方力量,保护与开发并举,“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第四,进一步加大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力度,并将其纳入党政干部考核体系。在保护红色文化资源的主体方面,地方党委、政府始终起着关键作用,其他途径只能作为补充。要加大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力度,必须增强地方党政干部的责任主体意识,坚持“属地管辖”的原则,才能避免地方政府在保护红色文化资源中的管理缺位现象。笔者认为,在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中,应该考虑区域差异,在注重考核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强调川东北地区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举措及其成效,使“红色文化保护”成为该区域党政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这样可以有效地激发地方政府的工作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政府职能,从而为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奠定制度保障。红色文化资源的珍贵之处在于它的不可再生性,对此可借鉴前人保存类似资源的“制度约定”方式。据悉,剑阁著名的“翠云廊(张飞柏)”数百年能保存完好,实得力于明清历朝地方官在职务交接时实行了清点移交的制度。这种明确责任主体的保护制度能有效地发挥地方政府对于红色资源保护的积极性。

第五,进一步整合红色文化资源,彰显其时代先进文化特质。川东北尽管分布着为数可观的红色资源,也呈集聚化的形态存在。但这些资源相对分散,从镌刻于悬崖峭壁的石刻标语到流传于民间的红色故事歌谣,内容十分丰富。这些红色文化资源颇具特色,可将其归纳为“五个一”,即红色第一联(“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现存中国军事历史博物馆)、红色第一缸(红“三十三”军打制,高1.2米、长约2.6米,现存万源战史博物馆)、红色第一刻(“赤化全川”石刻标语,现存通江县红云崖)、红色第一校(王维舟在宣汉创办的宏文工农学校)、红色第一陵(通江王坪红军陵园)。这“五个一”较为形象地概括了川东北地区红色资源的价值,凸显了其自身的文化特点。此外,反映川东北红色文化的一些影视戏剧作品如《红色记忆1933》、大型红色歌谣与音乐史诗《巴山魂》等也成为川东北红色文化资源中升华提炼的代表。因此,在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提升过程中,应发挥各方力量,集体协作,形成合力,并采取歌舞、影视创作等形式进行宣传,这对保存乃至开发红色文化资源可收到事半功倍效果。

第六,将红色旅游与产业链的构建有机结合。近年来,红色旅游方兴未艾,因为除了“向中国农村发展滞后的极贫困地区注入经济活力”外,强化游客的国家观念也是其重要内容。^①发展红色旅游也成为中央与地方政府拉动经济增长、创新社会管理、培养爱国主义情怀乃至培养

^① 转引自裴宜理、余婉萍译《重拾中国革命》,载《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23页。

感恩情怀的基本共识。近年来，为了深入开发红色旅游资源，相关职能部门还设计了多条川东北红色旅游线路。达州市及附近的著名红色旅游景点有神剑园红色文化陈列馆（张爱萍故居）、苍溪红军渡、万源保卫战纪念馆、巴中将帅碑林、通江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遗址以及朱德、邓小平和刘伯承的故居等。川东北有着极为丰富的红色资源，在分布上呈积聚的趋势，有尚待深入开发的自然景观（如通江县的诺水河、南江县的光雾山风景区，达州宣汉的百里峡等），更有延续千年之久的地方文化。因此，对于该地区而言，应注重打造自身的红色文化特色，尤其注意将本地的自然景观、传统节日、习俗与红色旅游相结合。以川东北重镇达州市为例，可以尝试将本地红色文化与延续千年之久的巴渠文化等人文及自然景观相融合，构建文化链，打造一条优质精品旅游线路，最终达到提升红色资源自身价值的目的。

四、结语

“救国救民”折射出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而在川东北的红色文化中，不怕流血流汗的“大巴山精神”则是其基本内核。对此，曾三次视察川东北巴中市的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对这种“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精神予以了高度赞扬。可见，弘扬这种踏实肯干的红色文化精神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契合的，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与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它是激发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与纽带。因此，在现阶段，在川东北乃至全国宣扬这种积极的民族精神气质，对于进一步加快文化强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川东北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内涵丰富，从物质形态的标语、钱币到众多纪念馆和纪念堂，从非物质形态的歌赋诗词到反抗压迫、不屈不挠的红军精神，都充分彰显了该地红色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亚文化特征。地方政府在进行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之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种文化特征，这样才能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红色文化品牌，否则无法在与其他地区的竞争中胜出。川东北红色文化的诞生及发展壮大与四川人民追求理想、不畏艰难的历史性格特征密切相关，正是这种独特的性格记忆，才使红色文化在川东北地区生根发芽并破土而出。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川东北地区出现的红色文化资源湮没、红色文化产业孤军作战等问题，亟待社会各界关注和解决。

在新形势下，川东北地区应主动抓紧解决这些问题，打好“红色文化牌”，将其融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潮流之中，并综合运用传统与现代的传媒手段，加大整合力度，推出创新文化品牌，在区域竞争中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抓紧落实《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中的相关精神及举措，增添措施，提炼特色，培育品牌，形成优势，以文化自觉与自新加快推进川东北红色资源保护与开发力度，努力推进红色文化在社会事业建设中的发展进程。

川陕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比较研究

宋 键^①

摘 要：川陕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和苏维埃运动在中国西南和西北的典型实践，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个大区域，一个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两者的斗争实践却共同揭示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特征：它们都是在重要战略位置上利用有利的地理优势建立的，都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光辉典范，其成就都是在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取得的。同时，两者工作开展方式不尽相同，因而有着不同的结局。

关键词：川陕；陕甘边；根据地；比较

川陕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和苏维埃运动在中国西南和西北的典型实践，在中国革命事业中有着各自独特的地位，斗争形式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但斗争实践有着内在一致的本质。对二者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对于揭示中国革命的规律、深化对中国当时的苏维埃运动的认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两个根据地的基本情况

（一）两者斗争持续的时间和发展情况

川陕革命根据地从1933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至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渡过嘉陵江放弃川陕根据地为止，一共持续两年零两个月。在这两年多时间里，红四方面军主力先后建立绥定、巴中两个道委和赤江、赤北、红江、南江、巴中、长赤、江口、苍溪、广元、嘉陵、恩阳、仪陇、阆南、长胜、营山、宣汉、达县、渠县、万源、红胜、英安、陕南、城口等23个县委和县级苏维埃政权，区苏维埃政权16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900多个，村苏维埃政权390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建设情况如下表）。全盛时期川陕革命根据地面积达42000多平方公里，在全国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84000平方公里，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大区域，辖区共有人口500多万。川陕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人民武装共有10万余人，其中正规红军有12个师、35个团共8万多人。

川陕苏区县级苏维埃政权建设情况一览表

发展阶段	名称	建置时间	驻地	县苏维埃主席	建立基层政权个数		
					区	乡	村

^① 宋键，男，湖南双峰人，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科研人员、法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初创时期	赤北县	1932 年 12 月	两河口，后迁泥溪场	谭永寿、刘道甫、赵友义、杨先知	5	24	
	赤江县	1933 年 1 月	毛裕镇	丁三斗、张正礼、王玉田	4	24	
	红江县	1933 年 1 月	涪阳坝	贺明善、李绍伯、赵海城、李文银	4	25	
	南江县	1933 年 1 月	南江县城	岳庄斗、吴宗涛、李正良、林白清	9	36	144
	巴中县	1933 年 1 月	清江渡	汤仕富、张庭奎、李如万	14		
	巴中市	1933 年 1 月	巴中县城	张得胜	3	12	
	陕南县	1932 年底	坪落、青鹤观、关庙	康洪礼	5	13	37
巩固发展时期	江口县	1933 年 6 月	江口镇	牟光彩	10	61	276
	仪阆县	1933 年 6 月	恩阳河	李尔吉	12	65	390
	广元县	1933 年 6 月	旺苍坝		10		
	长赤县	1933 年 6 月	长赤场	徐如万、何尧生、吴星寿、张崇政等	13	65	390
	恩阳县	1933 年 3 月	恩阳河	李尔吉	9	23	381
	苍溪县	1933 年 7 月	运山坝，后迁文昌宫	蒋德洪	12	81	488
	万源县	1933 年 8 月	竹峪关，后迁万源城关镇	李元善、赵某某	6	76	
	仪陇县	1933 年 8 月	仪陇城关镇	王心一、杨开益、纪洪贵			
鼎盛时期	阆南县	1933 年 9 月	水观音	李维海、蔡兴华、席德松	14	83	436
	嘉陵县	1933 年 8 月	元坝子	罗武中、赵龙来、王发元、刘开川、张万喜等	8	58	188
	英安县	1933 年 12 月	旺苍鹰嘴岩	彭阳山			
	长胜县	1933 年 10 月	仪陇立山场，后迁巴中鼎山场	刘国民、廖兰荣、刘国福	8	31	186
	营山县	1933 年 10 月	营山县城	郑子扬、邢占荣	10	61	317
	渠县	1933 年 10 月	渠县贵福	覃道善	6		
	宣汉县	1933 年 10 月	宣汉城关镇，后迁通江	廖开善、廖代勇、罗兴建	10	64	418
	红胜县	1933 年 10 月	万源罗文坝	张存禄	6	30	
	达县	1933 年 10 月	达县典狱署，后迁蒲家场	陈宗瑞、郭光田	11	85	
	城口县	1933 年 10 月	大竹河	周某某	6	18	

陕甘边根据地从 1932 年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建立至 1935 年 2 月与陕北根据地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为止，持续三年时间。西北根据地从 1935 年 2 月至 1937 年 2 月被中共中央正式改称为中共陕甘宁特区，持续了两年，合计共持续五年时间。这还不包括寺村塬根据地建立前的武装斗争，而且是持续到土地革命战争结束时依然存在，并未被国民党反动派“围剿”消灭，从而成为了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到 1935 年 2 月，陕甘边苏区已扩大到东至临镇，西界定边，南接

耀县，北靠高桥川、宁条梁一带，建立了庆北、淳耀、富西、富甘、定边、西靖边、合水等7县革命委员会和赤安、安塞、华池等县苏维埃政府”，陕北根据地辖区最大的时候设有赤源、秀延、延川、延水、绥德、清涧、佳县、吴堡、神木等九个苏维埃县治，形成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延（川）、神（木）府（谷）两块苏区。佳吴绥清延苏区包括今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子长、延川县的大部农村，靖边、安塞、米脂县东部和横山、子洲县南部的农村。神府苏区包括今神木、府谷县的大部分农村，佳县和榆林市结合部的农村。到1935年2月，两个根据地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后，红色区域已经扩大到北迄长城沿线，南抵北山南缘，东临黄河，西接环江的30个县，其中包括陕西省25县，即府谷、神木、米脂、佳县、绥德、吴堡、横山、靖边、定边、保安、安塞、安定、清涧、延川、延长、延安、甘泉、宜川、高县、中部（今黄陵）、宜君、潼关、耀县、旬邑、白水。甘肃省陇东5个县，即宁县、正宁、合水、庆阳、环县，辖区共有民众近100万，巩固和捍卫红色苏维埃政权的人民武装约有14000余人，其中主力红军发展到两个师、9个团，共9000多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

（二）两者对中国革命胜利分别作出的贡献

川陕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为当时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在西南和西北的重要实践，两者在中国革命事业中都占有其独特的地位，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一开始就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重视，被认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江西中央苏区遇到困难的时候，四川苏区的问题就提到了首要位置，“四川的红军拥有较好的武器装备，在战士数量上具有相当强大的优势，并不亚于中央苏区红军，它所面临的敌人比江西的敌人软弱得多”，川陕苏区“可以在中国苏维埃化的事业中发挥极大的作用”。^①毛泽东同志在1934年1月23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在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使蒋介石与四川军阀都不得不在红四方面军的胜利面前发抖起来。”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徐向前后来也有过客观的论述“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如果没有川陕根据地的桥梁和连接作用，将会增加更多的困难，造成更大的损失。那时，中央红军撤出了江西。陕北根据地很小。四方面军在川陕的存在，它所积蓄的革命力量，对于一、二方面军的长征，对于全国的革命，是个很大的支持和掩护。”^②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领导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南方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的情况下，红旗巍然不倒，为长征途中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落脚点，后来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对此，毛泽东同志有过多次论述。长征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就说“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③抗战伊始，毛泽东又指出“陕、甘是我们的唯一可靠后方。”^④七大前后，

① 《施特恩关于支持四川省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建议》（1934年9月16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37、238页。

② 徐向前《巴山烽火》，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187页。

④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698页。